

聲請解釋憲法				狀
案 號	年度	字第	號	承辦股別
訴訟標的 金額或價額	新臺幣 元			
稱 謂	姓名或名稱	依序填寫：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性別、出生年月日、職業、住居所、就業處所、公務所、事務所或營業所、郵遞區號、電話、傳真、電子郵件位址、指定送達代收人及其送達處所。		
聲請人 夏 刑 人	孫維賢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性別： 生日： 職業： 住： 巷 郵遞區號： 電話： 傳真： 是否聲請『案件進度線上查詢服務』： （聲請本服務，請參考網址： http://cpor.judicial.gov.tw ） <input type="checkbox"/> 否 <input type="checkbox"/> 是（以一組E-MAIL為限） 電子郵件位址： 送達代收人： 送達處所：現於宜蘭監獄執行中 如依法得保密其住居所，或認上開逐一分項記載有危害其安全之虞者，得陳明其理由，並記載送達代收人或送達處所。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性別：男／女 生日： 職業： 住： 郵遞區號： 電話： 傳真： 電子郵件位址： 送達代收人： 送達處所：		

解釋憲法聲請書

聲請人：

為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條第1項第1款規定聲請解釋憲法，謹就同法第8條第1項規定敘明如下：

一、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

因認最高法院108年度合抗字第1405號刑事裁定(下稱系爭裁定)所適用之刑事實體法第50條、第51條、第53條及刑事訴訟法第411條等規定(下稱系爭規定一)牴觸刑事訴訟法第310條不利益禁止變更(下稱系爭規定二)並牴觸憲法第8條、第16條、第22條、第23條有違法律明確性原則及信賴保護原則而侵害聲請人受憲法基本權及人權保障。立法機關為保護特定重要法益，以刑罰限制人身自由雖非憲法所不許；惟因刑罰乃不得已之強制手段，具有最後處罰因果關係之責任較重，所受逾越法規範之圭臬，但應受嚴格之限制及衡酌且人之壽命有限，而非法規範之刑罰抑束能有效的摒除犯罪之行為，縱為維護法秩序之生活規範，理應研採相稱之配套措施，而非相薪求火，應接

不暇使法秩序更加嚴苛而不符法治國原則。詳言之，國家擁有各式各樣權力，可介入人民之生活各種層面，對人民而言，國家權力皆蘊含重要意義，其中尤以刑罰權最具權力性表徵，並為其他權力之最終担保，是以格外受重視，不可言喻。國家藉由刑罰權之行使，對人民科以刑罰，限制或剝奪人身自由及財產權等。可見刑罰及刑罰權之行使自始與人權之緊張密切狀態。從人權保障觀點，刑罰及刑罰權之行使應受一定之制約，不得濫用。

一、然成文法即為台灣最高典範（憲法）。故之所謂人身自由是否有害於其人之壽命；並此何讓人民悉知規範所得理解之意義。次刑法第50條第51條第5款至第2款何者較有利於行為人（刑事訴訟法第2條定有明文），且量刑標準法無明文，而入監執行之效果是否有達到刑罰之目的，而非再犯若加重刑度，此此作為及有造成國家財政負擔，此何讓這種常態有鼎新的轉型以達第1條犯罪行為人的偷越法規範之行為。

揆觀刑事訴訟法第403條、第415條第4款，尚如聲請最罪併罰後，於法定期間5日內得依法提起抗告，再抗告觀

之，形式上似乎合於憲法第16條所規定之訴訟權，係以人民於其權利遭受侵害時，得依正當法律程序，請求法院予以救濟為其核心內容，國家應提供有效制度保障，以謀其具體實現，除立法機關須制定法律時，亦須以此目標，俾利人民於其權利受侵害時，有及時、充分回復並實現其權利之可能。確定之初，原非明瞭，必賴訴訟進行，次第形成，而後確定。然數罪併罰，依序為最後事實審法院裁定應執行刑，但基於檢察官合法聲請，法院依法行政行使自由裁量權在未進入最後事實審已經循序漸進的併合，而後再行變更，又必須受內外部界限之拘束，實質上併合之上下限已經嚴重影響行為人之法益，再則無一定之標準必常有所爭執，如何能夠行使訴訟權，實際上確如螳螂捕蟬，次以法院有過度造法功能之其專業知識，難期合乎武器對等原則，實有違實質訴訟權益。（下稱系爭規定三）。

又憲法第8條第1項規定「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除現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非依法定程序之逮捕、拘禁、審問、處罰，不得拒絕之。」其所稱「依法定程序」，係指凡限制人民身體自由

處置，不問其是否處於刑事被告身分，國家機關所依據之程序，須以法律規定，其內容更須實質正當，是故法律不得凌駕於憲法自明。申言之，憲法罪責原則的依據＝刑罰法律，基於無責即無處罰的憲法原則，人民僅因自己刑事違法且有責行為而受刑事處罰（司法解釋字第681號解釋參照）。法理自有其通之處，縱有所分別，也應予明確規範，刑法構造自不容有矛盾，疑義，否則即已破壞刑法結構而有違罪刑法定原則，刑罰須以罪責為基礎，並受罪責相對應（司法解釋字第51號及第669號解釋參照）。我國刑法於制定之初，於第1條前段開宗明義揭櫫罪刑法定原則，規定：「行為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除闡明罪刑須以法律明定外，更揭示課予刑罰的標準是行為刑法，而非行為人刑法，亦即行為負擔刑事責任應以其行為本身的要害程度予以非難評價（司法解釋字第51號解釋參照）。行為人的個人特質，例如身分、性格與心理素質等，本身對法益並無危險性或侵害性，行為人就此等特質，既無刑事違法且有責的行為，基於罪責原則，自不負擔任何刑事責任，亦不應受到任何刑罰。國家不得以個人特質作為非難或處罰人民的理由，此

乃係法治國立法的基本原則。

憲法罪刑相當原則的依據：由憲法罪責原則進一步衍生出憲法罪刑相當原則，國家所施加的刑罰須與行為人的罪責相當，刑罰不得超過罪責，罪責是刑罰的上限。基於憲法罪刑相當原則（司法院釋字第602號、第630號、第622、669號及第619號解釋參照），法律所設的處罰，須與法律所定之犯罪行為情節相稱，不得過苛，因此，立法機關應審慎其所欲維護法益的重要性，防止侵害的可能性及事後矯正行為人的必要性，綜合斟酌各項情狀，以法律規定法官所得科處的刑罰種類及其上下限，仍應對應該犯罪行為的不法與罪責程度，並應與該犯罪行為所生的危害行為人責任的輕重相稱，始符合憲法罪刑相當原則。

換言之，法律使受刑人入監服刑，目的在使其改悔向上，歸於社會生活（司法院釋字第155號及第156號、監獄行刑法第1條規定參照）。分析國家迄刑執行無成效的原因多端，或因監獄未徹底落實教化與矯正措施，致受刑人的社會危害性格未完全消除；或因更生保護制度的相關措施未予充分落實，致受刑人出獄後無法復歸於社會。

等，或因被告個人因素。也屬於監獄或更生制度等因素的徒刑執行無成效，自應由國家就刑罰執行、監獄管理、此功能及更生保護措施等各方面自應詳加檢討，不應將執行無成效的結果，全部歸責於受刑人的刑罰反應力薄弱，故之可束人身自由應適度而非以重刑相威攝，那已非對犯罪行為人單純的處罰，併同毀損、破碎一個家庭的心理層面，且以為人有犯罪行為所牽涉的必是大環境的遷動，許多的國家政策應避免過大的偏幅，增進公益利益，保護人民權益，也可行合法理理念自是國家施政者要有所作為而非以惡法作為以導刑罰目的。佛洛依德心理學家，曾有這麼一句話：「成功者不會用任何理由與藉口讓自己陷於失敗，失敗者只會為自己的失敗找尋任何失敗的理由與藉口，來修飾自己的失敗。」

而聲請人對於司法的改革有此感慨，愚者止於不敢面對突破，畏首畏尾，智者勇於面對打破桎梏，謹言慎行，從人的情緒有千多種如何突破並非心靜如水，必費課程的艱鉅，易讓人陷入迷思進而困惑，基於歧異的法律見解不明確的法制定令人感到費解。

再則憲法第一條人民其他基本權利之保障及其人性尊嚴。犯罪行為人致長期受禁錮於暗櫃內，屢有各種事上或法律之排斥或歧視，為社會孤立隔絕之少數並因受刻板印象之影響，久為政治上之弱勢，難期望由一般民主程序扭轉其法律上劣勢地位，雖司法界大法官們經由時序更新，日新月異的為台灣人民謀求法秩序的生活規範，更新憲法逐步尋求法理的規範蹤跡，可是司法並非司法權所壟斷。立法者（即民意代表機關）只看著政治變局，只求個人安穩，使人民對司法何其失望，憲政機關應要同業推動，整個台灣的政策並不屬於任何單位，是由個體有體制的相輔相成而來的，縱犯罪行為人亦是其中的個體，猶如棄一個個體即碎掉一個家庭并如何成為一個國，「家」難道犯錯的人是憲法之棄民，那該個體家中的個體亦是化外之民，何謂於此？

申言之，憲法第一條比例原則應實質正當，即法制應符合適當性（合目的）、必要性（侵害最少）原則，過度禁止（狹義比例原則）。（參見行政程序法第9條亦是憲法比例原則）為處理行為人之犯罪行為所實現的異構成要件間，如

何選擇適用的問題，學說上所提出的解決方案體系稱
作競合理論的核心是以行為單數的判斷為出發點，
判斷是否屬於行為單數三類型（自然意義-行為；法律
行為單數；自然的行為單數）中任何一類，若不符合，便確
定係屬行為複數。在行為單數中，倘若行為人只侵害一法益
，便屬法條競合，否則想像競合；在行為複數中，若行為
人侵害同一法益，便屬同種之前行為或後行為，否則為異
質競合亦屬併罰。異質競合：指裁判確定前，一行為人
基於數行為侵害法益（德國通說）或不同之犯意（實務）而犯
數罪，此數罪具備共同裁判之可能性，為求刑事執行
上之經濟，依一定方式（即舊體法第50條）併合處罰。其併合
處罰之方式有數種主義：（1）累加主義（2）限制加重（3）吸收主義
。惟刑法第50條、第51條、第53條並無明文規定，法律
之制定違背法律明確性、信賴法律，（縱釋字第98號裁
判確定後另犯他罪，不在數罪併罰規定之列，雖緩刑期
內更犯者，其所科之刑亦應於緩刑銷後合併執行）。其
釋字第202號、釋字第336號雖有關釋在案，其內外部界
限拘束於數罪併罰，另所犯之罪卻無從拘束，觀以憲法

第8條、第23條，拘束人身自由限制過苛，不成比例，亦無相
應配套措施，苟若原定其執行刑15年，因無法併合
30年。A，其原設15年1日合刑30年。A即超出原定
之刑何以無違弦？有期徒刑既然比無期徒刑更重，何謂
於此，顯失均衡即不利，即皆無救濟方式可言，以此該
律之矛盾如何納入法律體系，此以成不圓滿狀態過度
侵害基本權及人權保障。

次按執行刑之配足，宜綜合考量行為人之人格、各罪
間之關係，所謂各罪間之關係，謂綜合考量數罪侵害法益
之異同，對侵害法益之加重反應之程度，各罪間之密接程度等
為刑事裁判量刑之足執行刑參考要點第24點。又於逕
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等語。惟定應執行刑之法精
神本係因刑罰過深反應，隨刑期越長而減成，而犯罪
者所生痛苦程度隨刑期越長而遞增。為避免數罪併
罰過苛造成刑罰矯正目的之無效，因而在法定量刑範圍
內（即外、內部界限範圍）審酌各罪間之關係，量定對罪責
之宣告刑。故系爭裁定，系爭規定一、二，也可保障限制人身
自由比例原則、法律明確性原則、信賴利益保護、保障

實質訴訟權，維護人性尊嚴。

請求上所述侵害其法益時，爰依法聲請宣告終止訴訟，規定違憲。

二、疑義或爭議之性質與經過，乃涉及憲法條文：

(一)聲請人案由臺灣高等法院，臺灣最高法院

，臺灣最高法院，嗣於108年7月9日提起抗告駁回，又於

108年8月30日提起抗告，108年10月4日行再抗告下稱最終

向裁判，遂基於尋求正當法律程序，但已窮盡法律救濟途

徑，故而聲請解釋，法律牴觸憲法疑義，參事規定(一)(二)

案由臺灣高等法院裁定104年11月30年。月以併最罪併

罰有二裁判以上者，應依刑法第50條第51條，第53條決

定其應執行刑。又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

期以下。各刑合併之最低刑期以上，定其刑期，刑法第50條

第51條各款亦有明文。再按法律上屬於自由裁量事項，尚

非概無法律性之拘束，仍均應受其拘束最高法院91年

度公非字第32號，92年度公非字第187號判決參照。

逕查：聲請人於(卷宗內詳載)刑事聲請狀，聲請

最罪併罰，有如上開所述之法律，從形式上似以為合法。

其只是說明理由持法之依據敘明理由，此時就須看裁定法官是否研受，予認同，才為准許，法無明定之刑法構造只有破壞體制的平衡，如何裁定，該怎麼裁定都在所謂的自由裁量，那即是法官也是人，此際要以客觀或主觀抑或在未裁定前即已先入為主，行為人是破壞法秩序合時的人理應維持那所謂的公平正義何在，於法定刑處斷後（即處斷刑），於數罪併罰又須面對宣告刑之併合，如何併合才能達到刑罰目的，於罪-罰合於數罪併罰變合併不得併合之獨立性有違憲法第8條第16條第2條，法律明確性信賴利益保護而使法之安定性及產生既判力之動搖，如何求其平，大槪事不再發生，既得抽象規範法度應力求明確才不致妨礙人民受憲法之基本保障之權利行使，參照規定（一）（二）（三）之法律牴觸憲法。

（二）違反憲法第8條第16條第2條第3項第1項第1項。

三、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

依大審法第5條第1項第2款「人民、法人或政黨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生牴觸憲法

之疑義者，得聲請解釋憲法。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

(一) 憲法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之事實，及涉及憲法條文。

(一) 受判決人聲請最罪併罰，應受實質平等、責罰相當原則，平均的正義（個人間價值利益之交換維持均衡，以免互相侵奪而求其平）、分配的正義（共同生活實際貢獻之高低定利益分配之多寡藉以申明賞罰），所支顧及其人身自由、訴訟權、人性尊嚴、比例原則等規定，縱適用違憲自括下列三類型：

(一) 法令兼含可能合憲適用與違憲適用之部分。二者具有不可分之關係，無法切割作成合憲，限定解釋時，於其事件解釋適用上導入違憲部分限度內為違憲。

(二) 法令可能作成合憲限定解釋，但法令之執行者能為而不為，卻起以違憲適用範圍為違憲之適用時其行為為違憲。

(三) 即使法令本身合憲，執行者卻以侵害憲法所保障之權利自由方式適用該法令時，其解釋適用行為為違憲。

析言之，基本上，還是法律適用違憲與否的問題。

「因法令適用所產生的違憲疑義，在合適的個案中可能得予
適度轉化為法令規範本身是否違憲的抽象問題，例如法
令是否係因涵蓋過廣，未有適當的區別或排除規定等規
範的瑕疵，方才導致其被違憲地適用，因此追根究柢
該規範本身其實業已可能構成違憲。」

更況刑法第40條、第51條、第53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規
定有違憲之疑義，於法律文義並無周全且量刑無明確性之
導引，內外性界限所設保文違反憲法第8條、第22條、第23條
之憲法規定。

然刑法第59條所設在實務上的從寬適用為減上酌減
其刑之適用自應斟酌其適用條件，以免法定刑破壞罪刑法定
主義之原則，而量刑之輕重及最罪所罰應執行刑之酌定，同
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以行為人責
任為基礎，斟酌刑法第59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
酌量科刑，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但
最罪所罰依裁判確定前所犯罪之規範，跟隨不當，倘若司
其間所為即有共同裁判之可能性，若此一罪先行判決在犯罪
行為依然持續，縱然廢除刑法第56條連續犯，仍有吸收歸

係、競合關係之依第1條判決為基礎實質認定義。又併合決
定得予縮減並有其內外部界限所拘束而分別執行之合刑
沒有，而合刑後即超過原宣告刑，倘若如此，按裁判確定前所
犯最罪者，併合處罰之最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者，依刑法第51
條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同法第50條第1項前段，第53條分
別已有明文，若稱有二裁判以上經定其執行刑後，又與其他裁
判併合而更定其執行刑者，前定之執行刑當然失效，仍應以
原來宣告最重刑罰計算，而不以當時該最罪所定應執行刑
為計算之基準（最高法院51年度台抗字第98號裁定參照），而前
定之應執行刑，不應比前定之執行刑加計其他裁判所處刑
期後為重，否則即與法秩序理念及法律目的之內部界限有違
難認適法（最高法院93年台非字第92號裁定意旨參照）。

誠如上開意旨對刑罰權之分配，但其合刑既有獨立性，
以此合後即加計過重所超過原定應執行刑實有違常情（參
見行刑累進處遇條例施行細則第15條第1項規定，刑法第9條
之第1項規定）。

次按刑事裁判之量刑（最罪併罰亦同），旨在實現刑罰權
之分配正義，故法院對科刑判決之被告或聲請最罪併罰重

刑，應符合罪刑相當原則，使罰當其罪，以契合人民之法律感。惟此於刑法第51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各款情形，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又量刑輕重與否，固屬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為自由裁量之事項，惟法院行使此項職權時，除應審查被告是否符合法定要件外，仍應為比例原則與平等原則等一般法律原則之支配，以期客觀上之適當性、相當性與必要性之價值要求，若違反比例原則、平等原則時，自有濫用裁量權之違法。(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351號判決可資參照)。參見刑事訴訟法第2條第1款、第2款是否有明文審酌時應有注意嗎？

諸意旨，判決、裁定皆不斷提及刑法第51條、第59條，但數罪併罰及合刑卻無相當配套措施，又加諸累匪處遇，何謂司法改革、公平的正義、轉型的正義，卻一路亡羊補牢，使刑事政策侵害人民權益時逐日牴牾憲法及從古至今不斷的經由民主的時空、背景、社會需求不斷鼎新法制定，但刑法第51條、第59條、第53條及憲法第8條、第16條、第22條、第23條等原則。

(二) 所經渦之訴訟程序

聲請人因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先後經臺灣高等法院請求法院受押聲請數罪併罰，業由檢察官聲請，
為¹⁰⁴年11月31年。A.嗣因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裁定駁回，再行抗告，臺灣最高法院裁定駁回確定，已無救濟方式，為最終向裁判。

四、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

(一)受裁定人請求數罪併罰，應受憲法第8條人身自由、第16條訴訟權、第23條人性尊嚴、第23條比例原則、法律明確性原則、信賴利益保護原則、罪責原則、罪刑原則、等憲法保障。

(二)法治國原則為憲法之基本原則，首重人民權利之維護，法律秩序之安定及信賴利益保護原則之遵守。行政法規公布施行後，制度或發布法規之機關，依法定程序予以修訂或廢止時，應兼顧規範對象信賴利益之保護。受規範對象，如已在因法規施行而產生信賴基礎之存續期間內，對構成信賴要件之事實，有客觀上具體表現之行為，且值得保護之利益者，即應受信賴保護原則之保障。至於如何保障其信賴利益，除採取減輕或減免影響其依法定所取得法律上地位平等方法，則須衡酌法秩序變動所追求之政策目的、國家財

政負擔能力等公益因素及信賴利益之輕重，信賴利益所
依據之基礎法規所表現之意義與價值等為合理之規定，如
信賴利益所依據基礎法規，其作用不僅在保障私人利益
之法律地位而已，更是有藉該法律地位之保障以實現實益
之目的者，則因該基礎之變動所涉及信賴利益之保護，即
應予強化，以避免其損害，俾使該基礎法規欲實現公
益目的，亦得確保。

(三)故其所主張之立法文義並無健全而有違憲法疑慮；基於
法治國原則，以法律限制人民權利，其構成要件應符合
法律明確性原則，使受規範者可能預見其行為法律效
果，以確保法律預先告知之功能，並使執法之標準明確，
以保障規範目的之實現。法律規定所使用之概念，其意義
依該條文義，立法目的及法體系整體歸聯性，須為受規
範者可得理解，且為其所得預見，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
確認，始與法律明確性無違；又涉及拘束人民身體自由
之刑罰規定，其構成要件是否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因之，
為排除行政恣意判斷之餘地，讓人民有預見之可能性，
並使法律對於行政權之限制及司法救濟具實效性，法律明

確性原則乃必要之憲法原則。

而在刑法方面，更可從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及罪刑法定主義，導出刑罰法規明確性及構成要件明確之要求。一般認為，其要求明確性之目的，一在預先公正告知人民，何種行為為刑罰之對象，俾人民不至於無所適從；一在防止執法者主觀判斷，流於恣意濫權，而造成重大弊害。

(四)對於數罪併罰執行之宣告，學說及各國立法例有不同模式，原則上得區分為累加主義、吸收主義及限制加重主義；所謂⁽¹⁾累加主義，就是簡單的算數，將數罪分別所作之宣告刑以單純的加法計算所得總和作為執行刑之刑度，例如甲(2月+3月+4月=9月)。⁽²⁾吸收主義，是直接以數罪分別所作之宣告刑，其中最重之宣告刑當作數罪之執行刑，例如甲(3月與4月共三個宣告刑，其合併執行刑4月)。⁽³⁾限制加重主義，是以數罪分別所作之宣告刑，其中最重宣告刑之總和作為執行刑之上限，例如甲(2月+3月+4月，三個宣告刑之合併執行刑即為4月至總和9月之間選擇)。(參見刑法第41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如法定刑為6個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量處4月15日至3年9月間斷亦為合法。又於數罪併

四 罰金的減基本上都以(月)為單位。

倘若不得併合分別執行以15年加30年即45年，縱有獨立之處，但已超過原來之刑，且合刑後於累匪處遇更是雪上加霜，這對於行為人亦是不利益，廢除連續犯是因有鼓勵犯罪之嫌，那於裁判確定前之規定，更不符上揭憲法之規定。

(五) 古代的刑事法年代，採取的是累加主義的立法例(例如羅馬法以及古老的德國刑法)，人生絕非單純的加法，顯而易見這是對行為人極度不利的一種方式。之後人類的刑事法歷史，逐漸發展出加重主義或吸收主義等不同的立法模式。

學說上一般以為，對於數罪之執行刑不採取算數式的累加，理由就在於「責任原則」。由於人的資源(生命、財富、體力、耐心以及快樂的能力)是有限的，刑罰的增加，對於一個人的意義並不是相同數字關係上的相加，而是對於一個人的生命質的改變。5年加5年就數字而言固然是等於10年，但實際上，後面的5年很可能就使一個人對自己完全絕望的5年，甚至也很可能是結束生命的5年，以致於根本改變了刑罰的種類，質言之，其刑罰所帶來的實際痛苦並不符合於衡平。

原則。

我國立法例就是原則上採限制加重主義，例外採取吸收主義，除技術上必須採取吸收主義，也執行一個死刑，就不可能再執行其他死刑或自由刑，而執行一個無期徒刑，也不可能再執行其他自由刑者，其他有期徒刑以下之刑，原則上採取的就是限制加重原則的規定（參見刑法第51條）。

事實上，數罪併罰在一般人的感覺，可能就是簡單的加法計算，也就是重罰的意思。但所以法律之目的，就在以共同約束來修正甚或制止基於質樸正義感之下的想，當然爾的人性反義。我國刑法採取限制加重主義的立法，就是基於這個道理刑罰對受刑人最直接的意義就是生理及心理的痛，可是刑法第51條但書規定併合上限不得超過30年，但立法者可曾想過倘若因不符併合案件，另一條15年或30年，合刑加計即變成45年或60年這樣的連結合憲嗎？比無期徒刑還重，一個人的生命力能活這麼久嗎？段社會肢節這麼久早已無從舉動，台灣的刑罰目的應該是歸於人老或死的根底，而非具有矯正之效，這樣迂腐的目的，手段更

法律規範，合憲或違憲適用嗎？

(次)正如學者所言：一個具體的刑罰，其意義是被訂定出來，是透過法院的判決而被訂定出來的。例如某甲被法院判決1年有期徒刑，則其間最明顯的是，透過法院的判決主文，法院控訴者以及被告者理解，1年的有期徒刑是和被告過去所做的某一犯罪行為相連結的。

如果沒有法院的判決文，刑罰的本身和刑法規範根本就無從產生連結關係，從而刑罰的輕重或刑期的長短也不會自行反映以規範意義上的區別，例如兩倍刑期並不等於就承載了兩倍的不法侵害。到最後，要稍微能夠精確表達刑罰意義的是判決文字訂定。

上述某甲被告倘若另外又犯一個罪，被判處有期徒刑9月，法院可以合併訂1年4月有期徒刑，而非1年7月有期徒刑。當然，邏輯上我們可以堅持用算數式的累加原則來處理數罪併罰，因為算數式的累加原則也是一種訂定，為甚麼1年加7月不是1年7月而是1年4月？可能的回應必然要回歸到比例原則下的刑法謙抑。

白話文說，就是刑罰越小越好；如果一個比較寬容的

規定就可以達到相同目的。法官就沒有必要作一個嚴苛的規定。

(七)次將刑法第51條第5款最重併罰之規定，目的在於將各罪及其宣告合併斟酌，予以適度評價，而決定所犯最重最終具體實現之刑罰，以符罪責相當之要求。依該款規定，分別宣告之各刑均為有期徒刑時，於各刑中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原無受刑之宣告者，處於更不利之地。此之意（司法院釋字第662號解釋理由書參見）。

許云喬大法官於釋字第662號解釋協同意見書亦指出：「當犯最重而各有宣告刑時，原意應該地可處罰被告，刑法第50條最重併罰之例，的確是授權法官權衡個案，綜合考量各罪不法程度暨行為人的罪責，所定的執行刑，既不應該評價不足，也不可以過度評價。」

經過充分評價所宣告的執行刑，必須符合罪責相當原則，這也是比例原則的要求。

如果刑法第50條最重併罰所規定的定執行刑模式是保證充分評價與不過度評價的不法，那麼一律以最重宣告刑之和定執行刑是否即可顯現充分評價？從第50條各款的

現制觀之，可以知道，無期徒刑不能變成死刑，有期徒刑不能等同無期徒刑，以有期徒刑為例，如果有期徒刑的執行過長，即與無期徒刑無異，會變成過度評價。

相同道理，分別執行就不會過度評價合刑與合併是不同概念，合併有利於行為人，那合刑呢？量刑標準呢？法無明文。再者，國家使用刑罰懲罰或矯治犯罪，必須考慮手段的效益，使用過度的刑罰，會使邊際效用遞減，未必能達到目的，卻造成犯罪管理的過度花費，這也就是所謂刑罰經濟的思考。在上述双重意義之下，最輕合併是既定的制度，不是技術的問題，「內部功能」是依據罪責相當原則，進行充分而不過度的評價，「外部功能」則是實現刑罰經濟的功能。

(八) 罪責相當原則 除了對於人格、性格的評價，法官不能否認，越高的犯罪頻率越代表犯罪行為人穩定的人格傾向。因為不管是否另外承認心靈意義的人格概念，屬於人格的確定，法官很難說公理實中比犯罪數本身更具有證據意義的觀察工具。結論是犯罪行為本身代表行為人的人格，那麼站在尊重行為人人格的絕對前提上，的最犯罪

行的意義自然是責任減滅。

簡言之，基於罪刑相當原則，在多數犯罪是其應執行刑之情形，應有責任減滅原則之適用，而此處的責任減滅絕對不是如司法實務過往理解的操作方式，例如加一罪執行刑象徵性減1月加二罪減2月、加三罪減3月等模式，而是重在對犯罪人本身之所犯各罪情狀綜合審酌。換言之，法官應考量行為人從其犯數罪間所反映的人格特性並實現刑罰經濟的功能，尤其刑罰的兩大目的：應報與預防間的調和。從應報主義的角度，行為人所受的刑罰應該與犯罪行為成比例，單純的罪數相加是最簡單的反應，事實上，應報主義下的刑度確認，可能還不僅等加的1加1等於2，而是在應報情緒作用下導致更為極端的結果，變成1加1還大於2。

只見所謂的應報，雖然滿足了人們報復的心理，但是就在人們所希望建立的一個和平的社會生活而言，極可能是一個負數。

因此，學理大致還是把刑罰的目的定位在預防的作用，至於所謂應報思想，頂多是用來說明罪罰相當的

觀念。不過事實上，罪罰相當的觀念放在刑罰目的觀是什麼。

就預防作用而言，刑罰的機制是透過刑罰向社會宣示規範的威信。其中刑法對於越嚴重的利益侵害，基本上會對應以越嚴苛的刑罰，因為如此，社會人才會感受到特定行為的嚴重性，例如強盜比弱盜重，重傷害比普通傷害重，傷害2個人比傷害1個人嚴重等等。

問題就在，用來表達其嚴重性的工具，亦即刑度要如何形成？絕對不會是應報主義下的方式，因為那對行為人是違反比例原則的，對外部社會而言，另有違刑罰經濟功能。

(二) 對於確定終局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內容。

(1) 憲法第8條人身自由乃謂人民行使其憲法上各項自由權利所不可或缺之前提；第1項規定所稱「法定程序」係指凡限制人民身體自由之處置，不問其是否屬於刑事被告之身分，除須有法律依據外，尚須分別踐行必要之司法程序或其他正當法律程序，此項程序因屬憲法保留之

範疇，縱使立法機關亦不得制度法律而遽予剝奪；惟
刑事被告與非刑事被告之人身自由限制，畢竟有本質之差異
是其必須踐行之司法程序其他正當程序且非同一不可。
故此立法機關基於重大之公益目的，藉由限制人身自由之強
制措施，以貫徹其法定義，但其立法者未予審酌其人之壽命
有限，於刑之處斷後即置告刑之併合而只符合刑不符數罪
併罰而分別執行將之合刑加諸刑罰（即行為人不利益）之不
利，拘束人身自由，雖非憲法所不許，但其內容核心，已經循
序漸進的侵害於不法限制。

(二) 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之訴訟權，就刑事被告而言，包含
其在訴訟上應享公平之防禦權，所未應依正當法律程序
保障人權之基本權，貫徹訴訟基本權之行使之受公平審判
權利；更況聲請數罪併罰只有在文字法條上依該聲請而
每位法官認定不一，必有歧異之處，如何行使訴訟上之權益。
訴訟權係程序性之基本權，以保障其他權利及法律上之
利益為目的，而憲法第16條所謂訴訟權，乃人民司法上
之受益權，指人民於其權利受侵害時，有提起訴訟權，法
院亦有依法審判之義務，但訴訟權之意義、性質、目的，有

權利即有救濟之權；並無實質對應。依其憲法觀之形式上似為如此，但基於法之制定矛盾甚多，更況最罪併罰僅以文字敘明依其法律制定而所依附，縱使法張有限度，法之功能終為認論，從而最終結果有如呼喚效應，立竿見影，告貸無門，刑罰之嚴峻，若予以適度修法必然動一髮而足以動全身，人民訴訟權更有實質平等嗎？尚以抗告或窮盡法律途徑，大同昨夜而疏風驟，信箋隨之飄落。

3) 憲法第二條人性尊嚴，其內涵具體而言，指國家應採取必要之措施，使行為人培養出親近社會，適於社會生活的能力；其一方面得以理解為何應尊重他人，肯認他人價值與道德主體地位；另一方面，尋回生活目的與自我價值感並有能力自給自足，在社會中自主發展有意義的生活。然重建其自我價值及自主發展生活等等，皆與憲法維護人性尊嚴，保障個人主體性以及自由發展人格之意旨有深刻連結。

又於刑法第51條所列十款揆以觀之是否更有符合憲法第二條第三條第8條所拘束，其審酌評價之刑罰目的何以

刑罰正當，其目的有無不正者？抑或分段併合或合刑之，之整體效果尚非顯失均衡，又何以尚非顯失均衡，即為手段。受目的具有合理關聯？又或參酌刑案紀錄表就能透析人格犯罪特性，法官是否有先入為主之主觀意圖，種種客觀角度（情緒、觀感、等等），層面也皆於法官所謂本於生活經驗實務過程、經歷及論理（對於行為人所犯之罪的評價）犯罪行為人的心理因素或法官（生活壓力、心理因素）等。綜合評價且人之壽命有限，縱使犯罪行為人理應承受因果關係之責任報應，如何判斷，判斷依憑以何法源做為依歸，倘最罪併罰後有獨立分別執行之加計，只徒增法度過度侵擾。

(4) 按最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宣告之最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應執行之刑期，但不得逾30年。刑法第50條、第51條、第53條，刑事訴訟法第411條、第403條、第415條、第370條內容及文義尚有不足，且依法定訴訟程序以指告觀之，最終之法律結果皆盡微乎其微的有交叉救濟之法，又縱使最罪併罰採限制加重主義，但不得競合之最加計後往往會超過原法定之宣告刑，致使無法檢視整體評價，有違罪刑法定主義法之安定性及既判力，只徒增

違憲之可能性大增。

如法秩序理念及法律目的及變更不利益禁止原則是否
符合上開所揭示憲法第8條第16條第21條第23條罪責相當
原則、罪刑相當原則、法律明確性原則、信賴利益保護等原
則，爰請宣告違憲。

(三) 聲請人對於前項疑義所持見解：

(1) 刑事訴訟法是憲法的規則震義，只要形成矛盾規範即有違
憲之危險，更況臺灣社會以實憲法為主，毋以法律規範為本，
從法律風險管理角度而言，預防管理當以法律為主軸，培養
法律風險意識，在危機管理應本法律規範評斷控管以減
低風險責任而復原管理，則以法律為車由心，重新評量法
律風險威力，訂定防範策略是以法典具備深度完整性思考，
全體察法律真義，厚植法律堅實基礎。

(2) 然刑法第50條第51條第53條及其刑事訴訟法第41條規
定，張羅其造法，無法因應一罪一罰之配套措施，有違法定
性之既判力，雖數罪併罰所制定之法理與刑法第51條第
53條第71條及刑事訴訟法第310條有密切不可分之審判刑之
輕重而得符責罰相當原則、罪刑法定主義、刑罰彈平原則等

法理支配，亦與法官有自由裁量權之行使有其因果關係。

(3) 尚於法之制定，有矛盾規範、未予規範、疏而規範或應評價而未予評價、法與行為人之辯護人亦有尋求法規範之足跡，以資救濟，更況無辯護人（律師）者即違反武器對等原則之危險，必竟一般行為人並無如律師、檢察官、法官等受有專業知識經驗之訓練，諸公為官多年會不得而知嗎？更況受有專業者未必不會沒有歧異見解。

(四) 解決疑義必須解釋憲法理由：

時序更新，法制度更是依其時空背景、社會需求、立法理由隨時勢而變更，刑法第50條、第51條、第53條、刑事訴訟法第417條已不足因應現制所需，於94年2月2日修正刑法第51條、相繼於102年1月23日修正刑法第50條亦無實質變動，且於量刑標準法無明文未所收錄，合刑亦合理應併同審酌，否則與無期徒刑有何不同，刑罰內容亦無實質效用，且合刑與合併之區分於實質上「合刑」為獨立性不得縮減其刑，其罪責罪質之加計卻明顯突出又不受其內外部界限之拘束，使而其刑加計後處罰過苛，而合併雖受內外界限所拘束其評價似過於難統（個案情節不一）但卻有實質寬典（亦為縮減

其刑)、罪刑法第七條(連續犯(概括犯意)之廢除,其最
罪所罰與累匪處遇所謂合刑),基於憲法之保障則為突顯
法與刑的質與量,該法規範之質係為立法者考量是否立
法嚴峻,保護皇法益,又似巨獸啃蝕人之壽命(縱立法者有
立法自由形成,但基於民意機關亦不得逾越憲法),而量是
否為法定刑,處斷刑、宣告刑抑或競合後實際刑期的長
短是不符合犯罪後行為之處罰。而不得合併,只能合刑部分
更是加重刑罰處罰的結果,相形之下,合刑與合併雖突顯
有歧異之處,或因法之獨立性而隱約中與憲法相抵觸
。無論出發點從何發展,亦需與一罪一罰之法理有相對措
施,否則法理,在無形中已構成法秩序之違反。倘若無法從
繁亂錯綜的法條規範突破此桎梏,形專制型的司法
正義,將淪為情何以堪之僵局,如此束縛法理,如何與
時俱進,應該有明確釋明之規範,否則亂象之惡法亦無
法改變現時所需,推動憲政秩序。

(五)確定終局裁判案號之所援用之法律或命令:

(1) 新訂之法規,如涉及限制或剝奪人民權利,或增加
法律上之義務者,原則上禁止溯及立法(事後法),亦即對

人民而言，新法屬干預或不利益（限制或侵害）性質者，原則上應受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拘束；反之，新法屬授益性質者，或不屬干預、不利益性質者，不禁止溯及立法（事後法）。而新法屬干預或不利益性質者，於例外情形亦允許溯及立法（事後法）。

在現代法治國原則下，法律除須具備安定性與預測可能性外，亦應維護人民之自由權利，以追求公平正義。於界定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之準備範圍時，首須有此認知。其次，是否允許溯及立法（事後法），應依憲法之憲法上權利、法領域、事項、效果乃至時機，個別考量判斷，未可一概而論。例如，刑罰法規與人身自由息息相關，依通說絕對禁止溯及立法（事後法）。惟刑罰法規之修正，如有利於受規範者（減輕或廢止從前之罪刑），不致於造成不當之人權侵害，應不在此限。

(一) 是故，於刑法第1條罪刑法定主義，以同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為前提要件，且已執行完畢案件已無併合之實益，難道已受過嚴罰之罪責，縱已抹除，但併合不利於行為人，行為人就必須強行被法律拘束根柢承受，那有利於

行為人與不利於行為人之明文規定其法律意義何存，要是為官職所言即是客觀的論述，那官亦為民，只是身分地位不同，民所言論即為主觀，那所謂的官職的公權力（自由裁量權、證據取捨能力）就能恣意侵害人民法益，抑或立法者（民意代表機關）所謂立法自由形成就能造法對人民遽予剝奪，否則何謂於此？

(三) 確定終局裁判案號(108年度台抗字第1405號)於108年8月30日抗告駁回，再行抗告(108年度台抗字第1601號)(下稱確定終局裁定。因之，聲請人非具有相當法律訓練自無法與法官及大法官們所比擬，尚盼 諸賢耆能以民為念，為民喉舌，一本至公無私之襟懷，明法析理，以期公允。聲請人亦存乎亦冀，生之有望，幸念殘民誤蹈法網，深知法之威信，必不再有逾越法規節制之舉，請求 諸公依法審酌救正時於水深火熱之中，另檢附資料以資諸公斟酌，有疏漏不足之處，恭請 諸公代為補足，必冀諸公法學兼修具有專業法學素養，煩請 諸公諒察准予聲請人解釋憲法所聲請宣告刑法第50、51、53、保護良法律明確性原則、信賴利益保護、憲法第8條人身自由限制第

16條訴訟權第22條人性尊嚴第23條比例原則
最重判罪前所判之罪達處，不得併合只符合刑達處不符比例
原則。

